

历史与现实论稿

河北史学会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河北史学会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 潘志军

DQ48/39

历史与现实论稿

编者：河北史学会

出版者：中国文史出版社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发行者：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河北师范学院印刷厂

版次：1991年9月 第一版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8.25字数：204千

书号：ISBN7-5034-0231-8/K·170

印数：1-1180 定价：5.25元

前 言

历史与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是凝固了的现实，现实是发展着的历史。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或多或少有着历史的影子；现代人们的身上，总是带着历史文化的传统。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欲明大道，首先知史；以史为鉴的言论，屡见不鲜。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正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又是他们的教科书，他们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借鉴经验，大到军国的方针大计，小到坐卧起居的礼仪，都要寻找历史的依据。多少黎民百姓，也津津乐道于野史传说，以了解历史，增长知识，陶冶情操。可以说，历史犹如空气，弥漫于现实生活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余年来，史学界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进行了多次深入的讨论，从多层次上进行了考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当然，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为了使史学走向社会，推动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探讨，1988年12月，我会副会长苑书义教授倡议，筹办历史与现实学术讨论会，作为1989年度的主要学术活动。此议得到了会长漆侠教授、副会长胡如雷教授、张岗副研究员等同志的赞同，亦为省内史学界同仁所响应。由于种种原因，会议未能开成，我们从历史与现实学术讨论会所提供的论文中，选编成了这本《历史与现实论稿》。

本书所选录的文章，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历史与现实关系的理论探讨，从多视角，考察了历史学的功能、作用。二是研究古代史学家、帝王将相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对兴盛衰亡的

总结认识。三是对专史、断代史、思想文化、历史人物、事件等成败得失的研究，总结值得当今借鉴的经验、教训。又对四十年来历史与现实关系研究的情况写了一个综述，为对此感兴趣的人，提供线索。

同时，我们特地收入了胡如雷教授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时代赋予历史学家的中心使命》一文，这篇纵观古今史学兴衰变迁、论述时代与历史学家使命的文章，给人以启迪。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河北省社联的指导、资助，获得了中国文史出版社的鼎力相助，取得了作者们的大力支持。有些文章还得到了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教授、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林甘泉教授、我会名誉会长张恒授教授等著名专家学者的指教。史学界的很多同仁，为本书的出版，出谋划策，奔走搭桥。没有大家的支持，就不会有本书的问世，为此，我们向所有关心、支持、帮助过本书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负责本书统编定稿的是我会秘书长秦进才同志。收录的文章，大都经作者认真修订，有的几易其稿，反复推敲。但由于学识所限，深知错讹之处，难以避免，盼望读者不吝指教。

河北史学会

1990年10月

目 录

前 言	(1)
时代赋予历史学家的中心使命	胡如雷 (1)
独特的视角 独到的见地	
——谈毛泽东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基 本认识	邢 铁 (7)
历史反思散论	李奎良 (14)
历史文化传统与改革的精神机制	魏光奇 (23)
对中国传统史学功能的反思	孙洪涛 (35)
中华民族具有坚强的凝聚力	贺冬兰 (44)
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官制述评	萧 秦 (53)
古今廉政鉴识论	王晓华 杨爱民 (74)
整顿吏治对巩固和加强政权的作用	张金龙 (89)
历史的成败兴衰之理	
——汉代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 反思	思 宁 祝 华 (98)
三——六世纪中国史整体研究及其 现实性	牛润珍 (116)
宋代的朋党思想及其对北宋政治的 影响	王红信 朱红亮 (125)
“道德的弘扬”与历史的反动	
——简论清代前期文化对明中后期 文化的“扬弃”	乔福锦 (136)

从闭关到开放·····	黎仁凯 (145)
中国近代的“教案”、“反对外国 教会侵略”和“反洋教”辨析·····	董丛林 (155)
功昭青史 益留后人 ——一张之洞阻止澳门永久割让的历 史贡献·····	马兴华 (166)
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 的粮食斗争·····	黄存林 (173)
浅论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战略·····	麟 旭 (182)
略论中共中央胜利进驻北平的 基本经验·····	王聚英 王二尧 (191)
1946年国民政府“接受处理敌伪物 资清查团”工作述略·····	郭贵儒 (203)
论先秦儒家忠孝观的批判与继承·····	马 涛 (214)
“天人合一”——儒家的生命价值 观·····	王俊才 (224)
自由民权思想在日本近代史上的意 义·····	俞占禧 (233)
中学历史教学与育人 ——浅谈中学历史教学的社会功能·····	杨秉钧 (239)
四十年来历史与现实关系问题讨论 综述·····	孙功达 (247)

时代赋予历史学家的中心使命

胡 如 雷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现使历史学第一次成为真正的科学，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真理，但在部分史学工作者中，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历史仍然是一个在认识上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尤其是林彪和“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大搞乱了我们的理论战线，“评法批儒”严重地破坏了历史科学的名声，更易于使一些人在理论上发生动摇。

“回到乾嘉时代”的私议的出现，就是这种不健康的倾向的明显表现之一。因此大力宣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历史，在当前还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在这篇短文里，我不打算谈理论指导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为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一些同志发表了非常有益的文章可供参考；个人只想从史学发展的轨迹这一侧面谈谈粗浅看法。

唐代杰出的历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这一名著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其实，不同历史时代产生的史学名著，不仅是史体“不恒”，就是指导思想、研究方法，也会因时而异。如果历代史学仅只限于陈陈相因，那它本身就会无所创新，最终必然失去生命力。

每一个历史时代，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制约和史学发展规律的作用，客观上必然会向当时历史学家提出发展历史科学的中心任务。只有那些很好地完成了这一时代所赋予的中心使命的史学家，才能在史学史上留下自己光辉的业绩。至于非中心使

命的其他使命也是存在的，完成这些使命也是必要的，但就贡献而言，就不能与完成中心使命并驾齐驱了。文艺界目前号召作家要唱出“时代的最强音”，如果我们借用这一名词，史学界的中心使命也就是历史科学领域中的“时代的最强音”。

在汉代，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历史学家就有可能创建纪传体，为我国的一系列“正史”开先河。谁能在这方面有所成就，谁就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巨匠。适应这一客观要求的是司马迁和班固，前者编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史记》，后者写成了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汉书》。后代继续编纂纪传体史书的人大有人在，但他们的成绩就不能望迁、固之项背了。

唐代史学家的突出创建，是这个时期出现了探讨历史编纂学的理论，以及政书体史书，对我国历史科学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我国古代本来是文史不分的，但到魏晋南北朝时开始产生了文史分家的趋势，于是出现了专门性的文学批评论著：曹丕的《典论·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这就在史学家面前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即创立独立的史学理论。完成这一中心任务的是撰成《史通》的刘知几。隋唐统治者继秦汉之后要在典章制度上有所革新，需要借鉴历史；纪传体史书至唐代已经汗牛充栋，各书的书、志参差不齐，尤其是《三国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等书均有传无志，带来很多不便。这就在唐代史学家面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总结以前各书的书和志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撰写有关典章制度的通史就成为这个时代的需要，杜佑的《通典》正是适应时代的需要写成的。唐代编修《晋书》、《梁书》、《陈书》、《隋书》、《南史》、《北史》的史学家虽然也做出了一定贡献，但他们毕竟没有唱出时代的最强音，故其贡献不能与刘、杜二人同日而语。

到了宋代，由于政治斗争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名著应运而生，尤其是《通鉴》一书成为千古名著。在这样的时代，撰写《新唐书》和《五代史记》的欧阳修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司马光并驾齐驱的。编年体本身有“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的缺陷，给阅读带来不便，于是大量编年体史书的出现又在宋代史学家面前提出了另一个新的要求，即创建纪事本末体。完成这一使命的是撰成《通鉴纪事本末》的袁枢。袁氏创建此体，对《资治通鉴》虽未增一字，但“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清章学诚语），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这就为以后的《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开了先河，有始创之功。

二十世纪初，考古发掘有很大进展，甲骨文、汉简、敦煌卷子大量出现，西洋汉学东渐，历史学的发展又需要开创新的局面。于是象王国维这样的杰出史学家出现了，他们把考古学与史学结合起来，把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与西洋汉学结合起来，因而能做出新的伟大贡献，成为一代大师。陈寅恪先生不但能利用自己广泛的外文知识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以诗证史，而且力求发现中国中古时期决定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从总体上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尽管他所过分强调的种族和文化并不是决定历史发展的真正关键因素，但这种方法却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大大启发了史学工作者的思路。如果王国维和陈寅恪继续死守乾嘉遗风，闭目塞听，不问时代的新要求，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成为二十世纪的史学泰斗了。

由此可见，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应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认准当时社会的客观要求，力争为自己的时代唱出“时代的最强音”。我觉得自“五四”以来，史学阵地上的中心使命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

历史，当今的史学工作者应当首先在这方面力争有所作为。这一中心使命的出现不是任意的，而是有其必然性的。首先，“五四”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取代了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又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历史确实发展到了一个新时代。

“新”就新在这些革命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都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力量的。这样，时代就要求史学工作者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历史，通过这样的研究向全国人民传播科学的历史知识，宣传革命的理论。对于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是当仁不让、义不容辞的责任。其次，象陈寅恪那样杰出的史学家虽然也企图探求决定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但由于他不是正确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研究，因而始终没有发现历史发展的真正关键和规律，而对于我们这一代史学工作者来说，由于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就恰好能在这方面大有作为。如果今天再提倡“回到乾嘉时代”，那就不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阵地上倒退，甚至比起王国维、陈寅恪等前辈也是一种倒退。如果说，我国史学在“五四”以前在漫漫长夜中暗自摸索了两千多年，始终没有发现一条通向历史发展规律的光明大道，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光芒一旦照射到历史科学领域，就为我们开拓了攀登科学之巅的康庄大道。

我们这个时代，谁能在完成这样的中心使命方面做出贡献，谁就能成为成就最大的史学功臣。郭沫若同志正是由于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史料，分析甲骨文，才破天荒地做出了商代是奴隶社会的科学结论，为我国史坛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范文澜同志也是由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全面地研究中国历史，写出了一部又一部的巨著，得出了一系列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因而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史学家。回顾解放以来史学界所走过的历程，虽然在整理古籍、考证辨伪等方面也做出了不少成绩，

但我们最大的成就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提出、讨论和解决了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尽管在运用理论研究历史方面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产生过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我们在这方面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问题与缺陷只居从属地位，这是国内外史学界有目共睹的。运用马列主义研究历史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能够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研究生物学如果只把眼光局限于一科一目，甚至一种植物或动物，那就永远也出现不了进化论。达尔文之所以成为达尔文，就因为他发现了生物进化的规律。如果研究历史仅仅局限于考证历史人物的生年、卒年和某些史籍的成书年代，那就必然陷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永远也解决不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问题，正如同青蛙博士、蜻蜓院士永远也不能成为达尔文一样。

强调大量史学家从事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研究历史，并不意味着对乾嘉以来的校刊、考证之学可以弃若敝屣。用一定的人力、物力校点、整理古代的史籍是必要的，考辨史书的真伪版本、对史实进行考证都是不可少的。即令对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来说，史科学也是一门必需的辅助学科，考证史书、史事也是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因为运用理论研究历史必须以信实的史料做基础。单纯在理论的高空盘旋而不在史料上站稳脚跟，或者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引用了伪书和上了史料的当，同样都不能做出科学的、正确的结论。但以过多的人力、物力搞离开理论指导的研究，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考证、校刊上，就不合适了。我们应当把“兴奋点”摆正。

而且，即就考证工作而言，恐怕也需要有点理论指导，历来认为单纯搞考证、辨伪工作与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无涉。只要伏案读线装书就足够了。应当承认，干这一行，确实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也能做出成绩，乾嘉学者的学术成果大多至今仍有价值，并没有因时代变化而被推翻即是一例。但尽管如此，我总觉得

得，假如搞考订、辨伪工作也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那么无疑这种工作必将有显著提高，理论在这一行中并非无用武之地，譬如透过现象洞悉本质，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区分事物的主流与支流，力求全面掌握事物而不玩弄个别举例，要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前后发展变化观察事物而不要孤立地、静止地看待事物……这些方法运用到考辨史籍、史事方面是完全可以和必要的。古人没有学习过马克思主义，但确曾自发地、朴素地运用过这些方法，如果我们能进一步自觉地加以运用，岂不是会超过古人？至于根据史料的阶级性、政治派别性对它进行考辨，那我们所达到的高度更是古人所望尘莫及了。

（原载《光明日报》1982年2月1日）

独特的视角 独到的见地

——谈毛泽东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认识

邢 铁

限于人们自身的局限性，任何人对丰富多彩的立体型的古代社会生活的观察都是从特定的角度出发的，并且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地位、学识、阅历和情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过，就绝大多数人来说所站立的角度大致相近，因此对一些历史现象的认识程度也大致相同；当某个人站在其他人所不可能达到的特殊地位和角度上去观察古代社会时，便会产生与众不同的感想和认识。毛泽东同志就是这样一位有着特殊地位、独特的视角和对中国古代社会有着独到见地的人物。

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贡献不在历史学，他本人也不是专门的历史学家，但长期的革命实践，特别是当代中国最高领导者的体验，使他深刻感受到了解历史的重要性。早在1938年他就明确说过，作为一个领导者，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即革命的理论、历史知识和对现实的了解①，以往我们只注意理论和实践等条件，这是片面的理解。历史是凝固了的现实，现实是正在发展着的历史，不懂得过去就很难深刻理解现实和展望未来。众所周知，毛泽东同志一生中读过的书以史书最多，特别是对中国古代史籍，从正史、纲鉴、纪事本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98页。

末到稗史、笔记、演义，他都广泛涉猎，有的还反复阅读，圈点眉批，有着独到的心得见地。从毛泽东同志经常讲的要懂得历史、不能割断历史、“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①之类的话中可以看出，他觉察到了中国古代社会与当代社会的某些相似性。可以说，熟悉中国历史，并且认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重大问题和重要人物，是毛泽东同志能够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拨云劈雾，为中国革命指明航向的重要条件之一。

这里需要辨析一个问题。由于解放后在史学研究中出现过教条主义错误，近几年纠正时追根溯源，有的论著便或明或暗地将这种错误的责任推到了毛泽东同志身上，似乎毛泽东同志是教条主义地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套”中国历史的始作俑者。实际上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王明路线，而毛泽东同志恰恰是其反对派。我们知道，中国历史学界引进和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从大革命时代开始的，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使许多共产党人直观地认识到仅仅依靠与国民党的联合并不能救中国。但依靠谁？联合谁？打击谁？党内领导层有争议，反映到文化战线上便是著名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论战的目的主要是搞清楚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以便确定革命的任务、性质、对象和前途；而要认清当时的社会性质，又必须对中国以往的历史来一个系统的考察，看一下中国几千年来已经经过了哪几个发展阶段，这样，就必然产生中国历史的发展与马克思所揭示的五种生产方式规律是否符合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焦点，则是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制阶段。陶希圣等人认为中国没经过奴隶社会就直接进入到封建社会或“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甲骨文的考证入手，认定殷商时代就是奴隶社会，并进而指出此前尚有原始无阶级社会，尔后在战国或秦代进入到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99页。

封建社会。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科学地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奠定了基础，也使中国历史学的研究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确轨道。但是，限于当时的具体环境和条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时，为了强调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强调中国历史与世界各民族历史的同一性多，对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则尽量回避甚至否认，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沾染上了王明教条主义的痕迹。其影响在战争年代尚且不大，到建国后史学界普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历史时就非同小可了。加之毛泽东同志的政治地位和威望，人们常把他和马恩列斯的有关论述当成“指示”、“教导”，这就导致了教条主义的极端发展。但中国史学界教条主义的起源则不是毛泽东同志的责任。毛泽东同志一直注意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强调要“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①。并主张把特殊性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不能象教条主义者那样“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认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②。为正确地把握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毛泽东同志还提倡学习世界史，以资比较，所纠正和防止的就是受王明路线影响的教条主义历史研究法。

毛泽东同志不仅在理论上方法上倡导注意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在实际工作中也极为重视这一点，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和实践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便是明例，毋需多说。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时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性

①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载中央党校编《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86页。

的认识，即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突出强烈，或曰“政治”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观点。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一定的反作用。毛泽东同志也在许多场合论证过这一问题。同时，他从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和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意识到了这个基本原理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区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古代中国的二十四史实际是帝王的家谱，主要线索是王朝皇位的更替；毛泽东同志最为推崇、数读不厌的《资治通鉴》的主要内容也是历代治乱兴衰之迹与君臣之道，而与经济内容绝少涉及……加之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中国人民在经济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先进的社会制度，使他确信无论对自然规律还是社会规律，人的主观能动性是能起很大作用的。尤其在古代生产力（人和工具）几千年进步不大的情况下，社会的治乱兴衰就成为历史发展或倒退的直观标志；一个朝代或一个地区的安宁和动乱，也往往和某个君主或地方官的能力和個人品德直接相关；因此吏制问题就成了人们注目的中心。政治或上层建筑的概念，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具体到吏制上，吏制对社会的作用也就在事实上等同于上层建筑的作用，上层建筑对社会的（反）作用就显得非常突出了。毛泽东同志在解放前就多次表述过这个意思，解放后又明确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①。就主要方面而言，这个看法是符合中国社会的历史实际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国古代社会认识上的具体表述。

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观点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古代社会认识的基本观点，涉及问题的许多方面，这里仅以农民战争的作用为例具体分析印证一下。众所周知，毛泽东同志对

^① 《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载《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